

班固作《兩都賦》以法度析遷都之爭



唐代歐陽詢、陳叔達、裴矩等十餘位文學家一起編撰了一部綜合性的文學類書，是現存中國最早、最完整的一部官修類書，名叫《藝文類聚》，其中收錄了許多歷代的詩詞歌賦。全書共一百卷，是研究唐代以前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。

在書中曾有一段這樣寫道：「昔班固觀世祖遷都於洛邑，懼將必逾溢制度，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，故假西都賓，盛稱長安舊制，有陋洛邑之議，而為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。」

還都長安 反映百姓對前漢嚮往

這一段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事件：自東漢遷都洛陽後，很多朝中元老依舊希望仍以長安作為都城，他們認為過去長安是四夷賓服之都，但自漢末開始的外戚之亂，王莽篡漢，綠林赤眉橫行，把西漢的禮制全搞亂了。所以劉秀光復漢室後，為了安撫天下，表明自己是繼承漢室的正統，也特別重視禮制。他在建武六年（公元30年）和十年（公元34年），先後兩次到廢棄的長安祭祀高祖廟和前漢十一帝陵，又下令修復關中的橋樑、道路，這些舉動讓西土遺老感恩戴德。

其後，劉秀又企圖將國都重建於長安，作為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。不過，東都的新興階層卻願意留在洛陽，因此這「國都」問題，一時間成了當時的一個重要的話題。

建武二十年（公元44年），京兆尹杜篤上《論都賦》，認為關中山河，是先帝舊京，不宜改營洛邑。希望還都長安的呼聲時有所聞，反映人們對前漢昌盛時光的嚮往。班固的《兩都賦》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創作出來的。

班固（公元32年—公元92年），字孟堅，是東漢

時期傑出的史學家、文學家。初期繼承父親班彪編撰《史記後傳》，被人告其私改國史而下獄。其弟班超上書為其辯護，獲釋被召為蘭台令，又選典校秘書，奉詔修史。他就在《史記後傳》的基礎上，以二十餘年的時間，修成《漢書》，乃《史記》之後又一重要的紀傳體史書，也奠定了他在史學上的地位。而他善作賦，《兩都賦》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

折之以法度 衡之以王制

他這《兩都賦》，分為上、下篇，即《西都賦》和《東都賦》，寫的是大致作於永平、永元年間，在賦的正文之前有一個序，清楚交代了作文的原委和宗旨：一方面是「海內清平，朝廷無事，京師脩宮室，浚城隍，起苑囿，以備制度」；另一方面是「西土耆老，咸懷怨思，冀上之瞻顧」，於是作此文以「極眾人之所眩曜，折以今之法度」。

他將兩都的選擇、人們感受、主張的差異，歸納為法度的不同，從而賦予作品以較強的理性色彩。所謂法度，即儒家倡導的節儉、教化。所以序文先言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」，「昔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王澤竭而詩不作」，表明賦源出於詩，也注重「美盛德之形容」。

《西都賦》主要描述了西都長安地勢的險要、物產的豐富、宮廷之華麗等；《東都賦》則描寫了統治者對東都洛陽的秀美，以及歌頌統治者定都洛陽的各項經營和整治措施。

他這篇大作，結構與手法上都借鑒了司馬相如的《子虛賦》和《上林賦》，也模仿和引入了如「子虛先生」和「烏有先生」這樣的虛擬人物的「東都主人」、「西都賓」。不同之處是相對獨立成篇，內容又劃分清楚，結構較為合理。

《西都賦》寫長安都城的繁華壯麗，宮殿之奇偉華美，宮廷生活之紙醉金迷、奢侈淫靡。作者在寫作時也極盡鋪排之能，着實表現出了寫辭賦的才



●長安作為國都的歷史長達千餘年，足見其重要地位。圖為西安的長安塔。網上圖片

能。但結果卻不是越奢華便越體現着作者對它的讚揚，而是折之以法度，衡之以王制。

禮上下而接山川，究休佑之所用。採遼童之歡謠，第從臣之嘉頌。於斯之時，都都相望，邑邑相屬。國藉十世之基，家承百年之業，士食舊德之名氏，農服先疇之畝畝，商循族世之所駕，工用高曾之規矩。粲乎隱隱，各得其所。（《西都賦》）

《東都賦》寫洛陽，雖也寫宮室、田獵的內容，但比較概括，而從禮法制度出發，宣揚「宮室光明，闕庭神麗，奢不可逾，儉不能侈」，「順時節而蒐狩，簡車徒以講武，則必臨之以王制，考之以風雅」。並沒有大肆描寫宮室之美，轉而專注在法度和禮制上。文中說：「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，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；識函谷之可關，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。」完全以一個新的尺度來衡量秦朝和東漢

王朝政教之得失。

蜀若四瀆五嶽，帶河洛，圖書之淵？建章甘泉，館御列仙。孰與靈台明堂，統和天人？太液昆明，鳥獸之園。蜀若辟雍海流，道德之富？游俠踰侈，犯義侵禮。孰與同履法度，翼翼濟濟也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，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；識函谷之可關，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。（《東都賦》）

接着以西都賓的折服作為賦正文部分的收束，同《上林賦》的結尾完全一樣。

班固的《兩都賦》開頭、結尾、過渡等章法都嚴謹自然，且富於情態，長於韻味。而後人將此篇強調的「圖書之淵」、「道德之富」作為他反對還回西京之理據了。

●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

「道」為萬物本源 不受外力干涉

《道德經》第二十五章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「道法自然」四字，似乎很簡單，因為文不甚深。可是，這裏的「自然」是否就是我們認知的「自然」（Nature）呢？

追本溯源，「自然」本來就像「（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）眾多其他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技術術語一樣，中國從日本翻譯中引進了『自然界』這一新術語，並同時把英語單詞『Nature』的歷史複雜性疊加到對自然的本土理解之上」（羅濟《自然觀念的西方流變及其中國文化根源》）。換句話說，「自然」即是「Nature」是《道德經》面世二千多年以後的事。

事實上，日本對「自然」的理解，也並非只是「Nature」。森美術館館長、京都藝術大學教授岡岡真實在一篇刊於其官網的訪問中曾說：「我們所知的『自然』一詞，是19世紀末傳入日本的『nature』一詞的翻譯，但日本最初有『自然』（jinen）的概念，意為『順其自然』或『事物本來的樣子』。」據片岡真實所說，「自然」的根源在於「無為而自然」的概念。而且在日本，「自然」的翻譯並不是指與人類對立的荒野或原始森林，而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概念，涵蓋了人類所屬的整個宇宙，包括天地萬物。

簡單來說，我們不能說老子的「道法自然」就是道效法自生自長的自然界。而且，「自然」一詞在《道德經》一共出現了5次，更不見得每個「自然」都能對應「Nature」。

在接續論說之前，我想大家先理解一下老子的

「道」。老子認為「道」是宇宙萬物的本源，居於萬物的核心。在《道德經》中，「道」的內涵非常廣泛，但其作為萬物之始，又於天地之先而生育萬物，所以其地位是不變的崇高。

如《道德經》第四章，王弼在註中便指「道沖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」。按此推論，這宇宙之中，還有什麼事物先於「道」而生？又有什麼事物可以給「萬物之宗」的「道」效法？如果有，這個「道」又是不是老子的「道」？又是不是真正的「道」？

再者，既然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（《道德經》四十二章），「自然」（Nature）也不過是由「道」所生發出來，「道」又為什麼要反過來效法呢？

「道法自然」的「自然」是「Nature」的說法，其實從邏輯角度就已說不過去了。因此，「道法自然」的「自然」，應該就是指「自身」、「自己」。其中的「然」字，在古漢語中是作為「代詞」（如此、那樣），或者「助詞」（用作形容詞或副詞的詞尾，表示狀態，像「龐然大物」）。這一點，《老子今註今譯》的作者陳鼓應也是如此論說。

「自然」作形容詞理解

按著名哲學家劉笑敢的說法，「《道德經》中的『自然』雖然在語法上是名詞，但並不能簡單地將它等同於『自然界』。」他指出「道法自然」一詞的基本含義「仍是形容詞的『自己如此，自然而然』的意思」。

文苑英華

師生關係不和諧 張居正遭怨恨



可能因為是讀中文與歷史的緣故，筆者一直以來都喜歡看與中國歷史知名人物有關的歷史大

劇。前陣子看到內地將開播一套以明朝為背景的歷史大劇，劇中的主角正是明朝權傾朝野的第一文官及輔政大臣——張居正。

自古以來，只有很少的輔政大臣能夠善終，絕大部分人的下場無外乎兩種：一是生前或者死後家破人亡；另一是能直接篡位，如楊堅、趙匡胤或者給後人創造篡位的機會，如曹操、司馬懿。所以僅僅看輔政大臣的這兩條路，就知道皇帝為何往往和輔政大臣之間注定勢同水火了。

對於張居正這位大臣，梁啟超稱他為「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」，更說如果沒有他的改革，明朝可能滅亡得更早。然而這樣的一位大臣，卻換不來好的下場。究竟張居正的下場有多慘？要知道他的下場，我們便要來看看他一與萬曆皇帝的關係。

張居正，號太嶽，湖北荊州人，明代政治家、改革家；自幼已是個聰明人，他23歲即中進士，而且樣貌端正，由庶起士至翰林院編修，又官至侍講學士、翰林學士；萬曆朝任內閣首輔，是明朝唯一一個在生前就被授予太傅、太師頭銜的文官，軍政大事均由其裁決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明朝出現了一段時間的中興局面，史稱「萬曆中興」。張居正當政的時候權傾朝野，整個朝廷就是他的一言堂，皇帝尊他、太后護他、內廷配合他，他在施政的過程中可以說是毫無阻力。不過，也正是因為這樣，最後才導致了他的悲劇命運。

歷史上無數的文官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，就是輔佐一位明

君。張居正當然也不例外。然而，張居正相比其他文官有着絕對的先天優勢，因為他不僅是萬曆的大臣，也是萬曆的老師，而且皇帝恰好年少，完全能夠培養。

張居正為了萬曆的教育問題傾注了無數心血，並且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萬曆的身上，因此對萬曆的要求也特別嚴格，對皇子也很嚴厲，就如父親教育兒子一般，但他比當年呂不韋教育嬴政要嚴格許多，以至於後來的皇帝對他是滿滿的怨恨之情。

很多人都聽說過一個故事，那就是萬曆曾在上課的時候，讀書唸錯了一個字，張老師馬上大吼着糾正他，嚇得萬曆打了個冷顫。雖有言嚴師出高徒，但張居正的嚴已不只是嚴格，而是已經達到了嚴厲的程度。

萬曆剛當皇帝的時候，朝中的一切大事都由張居正說了算，他每天所要做的就是好好讀書，學着怎麼當一個好皇帝，張居正為此還給他編纂了一本專屬教材《帝鑑圖說》，對於年幼的萬曆來說，張居正其實是一個噩夢。如此嚴厲的教育對於一個普通的青少年來說，尚且難以承受，而萬曆更是一位皇帝，這樣的教育不僅給他留下了心理陰影，對他而言更是有損他皇帝的尊嚴，作為一個皇帝竟然還要害怕別人，叫萬曆如何忍受，又怎會不對這位輔政大臣有所怨恨？看到這樣的師生關係，大家應不難理解為何張居正不得善終了吧！

至於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功臣的真實下場如何，就留待下次再和大家分享。

●蕭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



《便橋會盟圖》 場面宏大有動感

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《便橋會盟圖》，是元代畫家陳及之創作的紙本白描畫，畫的是唐李世民化干戈為玉帛，在渭水便橋與來犯的突厥頡利可汗結盟修好的歷史事件。

公元626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剛剛即位，北邊勁敵突厥可汗頡利就率大軍侵犯長安，直抵城外渭水便橋，形勢十分危急。橫跨在長安附近的渭水上，有「渭河三橋」，而「便橋」應是「西渭橋」。史上「便橋之盟」又稱「渭水之盟」，指的是突厥突然攻至距長安僅40里的涇陽（今陝西涇陽縣），京師震動。

此時，長安兵力不過數萬，唐太宗李世民只好設疑兵之計，親率高士廉、房玄齡等文官，在渭水隔河與頡利可汗對話，怒斥頡利、突利二可汗背約。《資治通鑑》記載，唐太宗終以殺白馬與突厥可汗結「渭水之盟」，突厥兵於是退去。

畫家陳及之就根據這一故事畫了一幅《便橋會盟圖》。後人根據圖中的「款」寫着「祐申仲春中瀚富沙竹坡陳及之作」，以及「鈐印」（書畫上面的印章）寫着「竹坡及之戲作」，可知該圖是陳及之作於元朝至治元年（1321）的三月。

陳及之，號竹坡，生卒年不詳，畫史亦沒載，約是元仁宗（1285—1320年）時期的人。他應為文人畫家，以白描人物見長。該卷畫述及「便橋會盟」的故事，全卷可分為三部分，全圖共繪了

246人、180匹馬和4頭駱駝，堪稱是元代繪人馬最多、物景最宏大的歷史畫。

該圖分為三段，在藝術欣賞和文化賞析方面，反而在描畫胡人馬隊為重：

第一段：「出山」：山溝裏湧出大群騎隊，表演舞旗和馬上雜技、馬球等，本段的要旨在於展現突厥人的生活風情，為與唐朝會盟，起了鋪墊作用。

第二段：「歇息」：經過一番馬上運動後，疲憊的人馬漸漸停歇下來，以此過渡到下段。

第三段：「會盟」：為全卷的主題。描繪突厥首領頡利在便橋橋頭向秦王李世民講和的情景。左側是頡利可汗和僚臣，戴冠者的突厥民族，與第一段馬術馬球中的冠式截然不同，頡利可汗扎的頭巾類似蒙古族牧民的裝束，以示他欲馬放南山。而李世民端坐龍車上，神情威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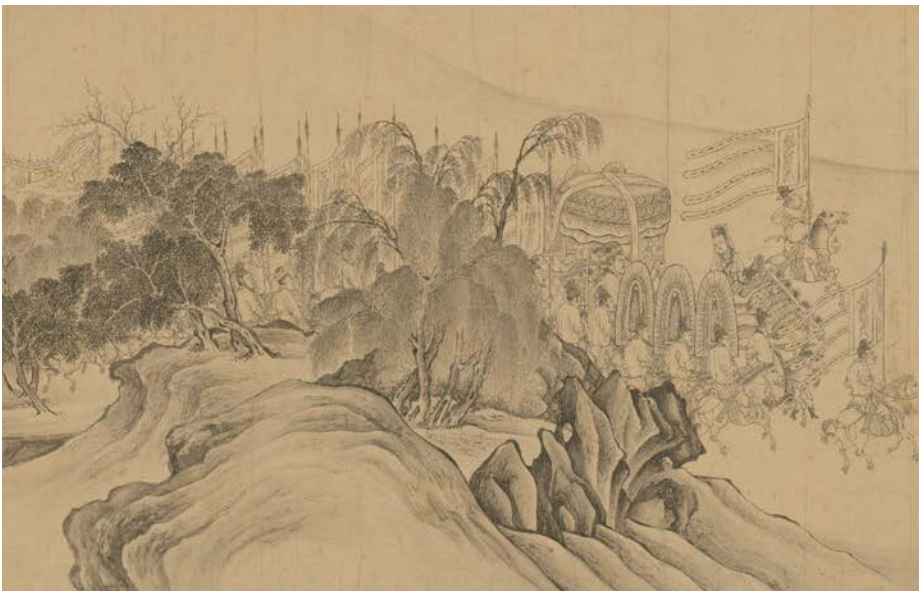
有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介紹過：「畫家的白描手法有李公麟的筆墨基礎，但不落前人的窠臼，揮灑自如，線條柔和暢快，細微之處仍見精神，帶有戲劇色彩的人馬動態被描繪得飛動自然，充滿了節奏感，坡翻的畫法極為簡率，使主題突出。」這是在美術眼光方面去看，自有其細膩值得欣賞之處。

反映少數民族衣着服飾

在研究人文生活和文化方面，也有值得細心分析之處：畫中黨項人的髮式和女真人的衣冠服飾十分接近，而且他們手持女真人的圓月旗。據歷史所記，在元初時，確實有大批黨項人遷徙到華北一帶，接受了女真人的統治，也讓作者有機緣接觸到黨項人的生活。

卷中人馬的組合，動靜、聚散有致。人馬的動態幅度大，變化多，富有節奏感。由於場面宏大，畫中人馬僅有寸方左右，但無論是人和馬的神情形態俱覺自然。騎手在進行馬術表演時，更露出談諧幽默的表情。畫家在勾畫馬匹時，更善於抓住馬在運動時的體態，十分生動，而且線條粗勁渾厚、簡潔鮮明，顯示出作者極強的藝術概括力。

●任平生 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



●《便橋會盟圖》（局部）。

網上圖片